

[英] 马林诺夫斯基 著



野蛮人的 性生活

团结出版社

野蛮人的性生活

——关于（不列颠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
德群岛土著的求爱、结婚和家庭生活的
民族学报告

〔英〕B. 马林诺夫斯基著

刘文远 纳日碧力戈 马殿君 等译
王庆芳 安明玉 王 威

团 结 出 版 社

野蛮人的性生活

(英) B. 马林诺夫斯基著

刘文远 纳日碧力戈 马殿君 译
王庆芳 安明玉 王 威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四二二九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 年 7 月 (大 32 开) 第一版

1991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

字数: 360 千字 印张: 14.625 插页:

印数: 8001-18101 册

ISBN7-80061-153-1 / G.41

定价: 8.40 元 (平)

0.1 前 言

哈夫洛克·埃利斯

野蛮人的性生活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它的自然史学家。由于性禁忌至少象压迫文明民族一样压迫着野蛮人的思想，因而使这一领域总是具有一种神秘性。根据偶然风行的对野蛮人的普遍看法，这种神秘性既诱人又暗淡。在18世纪，它曾一度令人神往不已。当时，尤其在法兰西时尚中，实际上发现了被不明确地、不妥当地称为“原始人”的人，并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新极乐世界中找到了他最好的化身。当那些奇异而又经常如此优美迷人的风俗和习惯展现在法国航海家和传教士（尽管其中还有几位著名的但更严肃的英国人和其他海员）面前时，他们都感到欣喜和陶醉。他们不理解那些风俗习惯，也没有深入表象之下去探讨，但他们忠实记载下来的强烈印象，是生活在极为不同的人为状态和习惯中的巴黎世界意想不到的。随后，塔西图斯（Tacitus）在原始德意志森林中瞥见的生活于“自然状态”下的“高贵”野蛮人的观念得到了发展。19世纪兴起了一种傲慢的看法，与鲁索（Rousseau）关于自然人的肤浅和富于想象的看法很相似。但有足够证据表明，鲁索实际上一直是当时探险家们的叙述的忠实学生。他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比后来几代人的结论更过头，后者走向另一极端而且今

天仍在坚持。同样，戴迪卢特（Diderot）在他著名的《布干维尔岛游记补编》中向他的同胞展示有关塔希提人性道德~~高度~~合理性时，提出了各种准确的实例——已在这位伟大的航海家~~的~~的纪事中记录下来——但却很容易令人误解，因为他忽视了他们所属的社会组织。

在19世纪，更忧郁的观点盛行起来。现在探险者主要是英国人，他们带着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偏见，认为所有不同的性爱风俗令人既震惊又讨厌。“淫秽”一词被普遍使用，它引导读者想象它可能意味着什么样的图景。野蛮人的性行为看来多半是不可言喻的。某些澳大利亚部落实行的割礼被神秘地称为“可怕的习俗”。类似的割鼻、耳，或加高削低其他部位都不会被看作“可怕的”；只是那个特别部位的切割引起人们的战栗和羞怯。

在20世纪，我们的态度已变得比较冷静。我们正学着用不太严肃的眼光观察自己的性忌讳。同时，在考察少数尚未完全处于我们自己文明影响下的民族时，我们需要一种更科学的精神，既不逢迎又不轻视，而把它们看成是对我们所不熟悉的人类共同特点各个方面有价值的印证。受过科学训练的剑桥考察队对托雷斯海峡的考察，及随后由象里弗斯和塞利格曼这样杰出的人指导的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考察，可被视为历史的里程碑。但我们仍然徒劳地渴望着一幅未堕落民族的性生活图景。一两个考察者，如罗思在昆斯兰，已注意到了一些性生活的明确客观根据。近来，费利克斯·布莱克（Felix Bryk），在他的《黑人爱神厄洛斯》一书中，对赤道非洲人的性生活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但仍不易发现任何真正综合的图景。

确实，这样的工作需要具有多方面素质的人来做。不仅有科学设备，而且要熟悉各种新思想；不要总考虑符合科学规律，那是近来才归入人类学领域的。还需要长期而密切地调查他们的知

识和语言，因为性生活不仅仅在文明社会趋向隐蔽和退缩。同样重要的是调查者还需要有一种从盎格鲁-撒克逊清教主义继承下来的自由传统。我们虽然理解他们的处境，但仍然要反对他们那些极端保守的可怜的传统。

所有这些素质——科学的素质、敏锐的理解力、观察的耐心、和谐的洞察力，都卓越地集中在马林诺夫斯基博士身上。他以大量从社会学角度论述野蛮文化的著作而知名。这些著作建立在他对新几内亚东海岸特罗布里恩德人的研究基础上，他曾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他的《西太平洋阿尔戈远游队》——对特罗布里恩德人独特的“库拉”交换制度的最早的和详尽的研究——被公认为是民族学研究的辉煌成就。实际上，它不仅仅是民族学的，正如推荐此书的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所说，它是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充分考虑人类本质复杂性所用的特殊方法。一眼看来，它可能仅仅是经济制度，可经他的分析研究后发现，那不仅是商业制度，而且还同巫术和祭祀联系在一起，这种祭祀是为满足采用这种制度的人们的感情和美学需要而举行的。

正如我所评论过的，对性问题的考察只有在今天才成为可能。这并不简单地因为我们的性忌讳最后失去了某些说服力，而是象培根所说，因为它们已成为人类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性问题的研究除完全误入歧途外，还是感情用事的狂言。它现在——由于我们的努力——或者已变成自然历史范畴，由自然学家以公正的态度进行研究，或者变成心理动力范畴。这种通常深藏在表层之下并采取奇怪的形式，甚至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力量看起来大多来自遥远的性。在这一领域内，弗洛伊德的才华——象某些人所想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大了——促进了对性冲动的研究以及在野蛮人神话和习俗中可能的表现的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趋势。有一次他甚至打算做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比我们今天所能描述的更接近。但目前他既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又不是反弗洛伊德主义者，他认识到弗洛伊德思想的丰富价值，并准备当它们有助于解释调查现象时利用它们。他用一种独具特色的宽广的眼光观察这些现象；在不忽视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性爱艺术的明确技巧的同时，他充分考察了他们与美学、情感、家庭和社会范畴有关的全部性生活。现在他已证明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因此，其他学者无疑将奋勇追随。但在这个领域内并非所有点了名的人都能选上。《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有把握成为一部价值与日俱增的杰作。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谈这部书与科学的关系。但我相信它还有更宽广的联系。它不仅会引起那些关心社会生活起源和那些认为它们或许是社会生活外来形式的人的注意，还将引起那些关心现在或未来国内社会生活方式的人的注意。

虽然已经确认，但我们经常忽略这样的事实——进化的速度和水平并非完全相等。我们未把黑人置于人类发展的顶峰，但某些时候他们在身体素质上比白人还发达。或者，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一些，众所周知的赤足马已达到很高的发展阶段，比其他一般的鳞甲动物进化得多。所以在心理方面，我们习惯于认为古典文明在许多方面高于我们的在其他方面已进步了许多的文明。

我们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有史以来人类性生活中的性问题。有人可能注意到它在那些文明程度很低的民族所开发的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其他文化领域的吸收实际上都有损于性文化。我们知道，物理学科的奇异发展和智力范畴的崇高成就应该与那些不能公开讨论的退化为习俗和惯例的性文化并存。对更复杂的人文学科成就保持敏感和关注，同时在更基本的

学科中保持天然特点是可能的。

所以可能碰巧，在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向我们展示的图景面前，我们会明白，这不仅是对人类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而且是关系文明生活及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建议。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社会的小团体；它只提供了野蛮人诸生活一种的类型，尽管那很可能是极典型的一种类型。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仅在这一领域内野蛮人很象文明人，具有不同形式的恶行和美德，而且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在某些方面这些野蛮人达到了更高的文明程度。这样，我们所进行的对比还为批判地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提出了建议。

0.2 第1版序言

我之所以给这本书选了一个最平凡，易言之也是最真实的题目，一方面是为“性生活”这一必须又经常误用的术语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是为在那些最直率的段落中秉笔直书读者所期望的事情。与我们相比，性对南太平洋岛民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问题；它意指爱情和造爱；它成了诸如婚姻和家庭这样古老制度的核心；它渗透于艺术之中并创造了艺术的吸引力和巫术。实际上它几乎支配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性，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正如我在本书的书名上所使用的——与其说是两性间的身体关系，不如说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动力。然而这一问题的科学处理还明显涉及到生物学的核心问题。因此人类学家必须对两位情人间的直接表现做出描写——诸如我们在大洋洲发现的，他们遵守固定传统、部落法律、部落习俗的表现。

在人类学中，生活的基本事实必须用科学的语言简明而充分地表述，并使这种直率的语言既不真正触怒最敏感的感情，又不真正冒犯最有成见的读者；对追求色情描写的人没有任何益处；它尤其不会引诱年轻人未成熟的兴趣。因为淫欲只存在于躲躲闪闪的白日梦里，而不在简明而直接了当的描述中。读者将发现，土著人最终不仅仅把性看作为快乐之源来对待，而且确实作为一件严肃甚至神圣的事情来做。他们的习俗和意识并不排斥性，它的力量把粗鲁的物欲行为变成美好的精神体验，把爱情的罗曼蒂克魅力扔到调情技巧的背后。特罗布里恩德的社会制度允许用单

纯的兽性激情促进毕生爱情的成熟，允许充满个人吸引力并允许通过各种契约和由于孩子出生而产生的依恋，通过彼此的渴求和期望，通过家庭生活的共同目标与兴趣使其加强。

也许正是在直接肉欲和罗曼蒂克的混合中，在导致首要的私人活动这一广泛而重大的社会学后果中，爱情的丰富与复杂展现着它哲理上的神秘性，对诗人的魅力和人类学家的兴趣。特罗布里恩德人爱情的多面性同我们的一样，当它最初接近我们时极可能表现得粗鲁和无法控制。

然而，如果一部科学著作忽视了后一方面，即避开爱情的物质基础，它的结论也就没有任何意义。那就等于犯下了回避真正问题的不可饶恕的罪过。任何不希望参与性问题的人都无需学习或阅读此书；而那些以不科学精神接触这一课题的人在开始就应得到警告，他们在后面各章中不会找到任何挑动色情或诱惑的东西。

我想让大家明白，分散于各章特别是最后几章中的当地和欧洲情况的对比，还具有社会学上的作用，因为它们相似之处太少。土著——欧洲相似性的不足在本书中还有为我们的缺点提供说教和为优点提供赞颂的功效。因为对比很简单，有必要回顾相似的事例以解释奇怪的事实。人类学家在他的观察中不得不通过自己的生理学常识理解土著人，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所了解的自己的和他人的自然环境来勾勒外国文化的图画。实际调查工作的全部困难和技巧包括突出那些与外国文化相类似的因素和明显不同的因素放进一个可理解的环境中。在这方面了解外国文化如同学习一种外国语言，最初只是吸收和进行粗糙的翻译，后来就从新环境和新语言的掌握中独立出来。既然适当的民族学描述必须来自逐渐的、漫长的、平凡的小型实地调查工作过程，那么就必须把对欧洲和特罗布里恩德之间类似和相同之处

的论述作为开端。

总之，为说服读者，我不得不依赖我在我们社会中积累的个人信息。正如我必须用英语写作，并将土著术语或引语翻译成英语一样。为使它们更真实、易理解，我也不得不将美拉尼西亚的环境译成我们自己的。在这两个过程中任何错误都是难免的。一位人类学家可能很了解 *traduttore traditore*，但他无法翻译它——他不能把他的少数热心读者放逐到南太平洋的环状珊瑚岛上去，让他们亲身体验；唉！谁让我一定要写关于野蛮人的书并讲授它们呢？

关于描述方法问题还有一点要说明。每个谨慎的、经过科学训练的考察者不仅要表明他知道了什么及怎样知道的，还要指出他所了解的知识之间的那些缺环、在实际调查中的失败和遗漏。我已经提供了《西太平洋阿尔戈远游队》第1章）我的合格证的充分理由：在岛上度过的时间，语言资格，收集文献和描述的方法。在此我不想再重复它们，读者在正文中（第9章第9节；第10章引言；第12章和第13章的引言）将会发现一些关于土著人内部生活的艰难研究的必要的附加评论。

有能力有经验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只要是一个对精确限度、证明的方法论、知识的空白感兴趣的人——会很容易地从本书所提供的资料中发现，哪些地方文献薄弱，哪些地方充分。当我做出一种简单陈述而又没有说明它是由个人观察得来抑或是引证的材料时，就表明它们主要来自我的调查合作者的讲述。当然，那是我的材料中可靠性最小的部分。

我尤其意识到，在产科知识和妇女在怀孕与生育的态度方面，我所知甚少。此外，对孩子出生时父亲的行为及关于它的男性心理，都没有专门的充分研究。全书中许多较次要的观点是按有待于专家弄清的方式处理的，不仅是那些地方的材料不完备而有空

白需要填补。关于大多数重要的基本观点，我相信已水落石出了。

一个很可惜而又难以补救的空白是直接表现性生活的插图太少。然而，既然这是在隐暗之处发生的事情，用文字与用图形，其效果是一样的。图片只能臆造，或充其量不过摆好姿势——臆造或摆好姿势的热情是没有价值的。

对在实地调查工作中所得到的帮助，我在所有著作中都曾表示感谢（《西太平洋阿尔戈远游队》）；但我愿在此对我的朋友比利·汉考克（Billy Hancock）——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商人和珍珠收买者——表示特别的感谢，在我写作此书时他已神秘地死去了。他生了病，正在新几内亚东部的欧洲人居住地萨马利（Samari）等待开往南方的船只。有一天晚上他失踪了，从此再没有人看见或听到他的消息。他不仅是个杰出的情况提供者和助手，还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在那些艰难和烦闷的生活时期，他给我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极大支持。

在写作本书时，我受到哈夫洛克·埃利斯先生的关注和极大鼓励，他作为先驱者的工作和榜样在忠实思想和直言的研究方面是我永远钦佩和尊敬的，他写的序言大大地提高了本书的价值。

近年来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人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我的一群朋友、学生和同事，极大程度上帮助我澄清了思想，并赠送我材料，特别是关于家庭生活、亲属组织和婚姻法规方面，罗伯特·艾特肯太太（巴巴拉·弗赖里—马雷克小姐）、R. W. 弗思博士、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先生、卡米拉·韦奇伍德小姐、戈登·布朗先生、霍顿斯·波德马克博士、I. 沙佩拉先生、T. J. A. 那茨先生、奥德丽·理查德小姐的名字，将同本书那些非常困难的社会学各章的起草工作联在一起，令我终生铭记。

如同我所写的大部分著作一样，在本书中最大的帮助来自我的妻子。她的意见和实际合作使《西太平洋阿尔戈远游队》和本书的写作变成一种令人愉快而非单调乏味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如果对本书有任何价值和关注的话，也得之于共同工作中她的帮助。

B. 马林诺夫斯基

1929年1月于伦敦

0.3 第3版特别序言

我之所以为新版的《野蛮人的性生活》写下这篇颇为冗长的前言，是因为我对这本书有些失望，尽管它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和鼓励。本书已用4种语言出版，英国和美国各有两种版本；其他译本正在翻译中；评论家们一直是友好和愉快的——然而我却不满意。我猜想没有任何作者会满足于他的书在精神上被人所接受，或按该书所设想的那样被理解，当然，这总是作者的错误。

我对本书所受到的欢迎感到失望，因为我希望它被看成是一种实地调查和方法应用的成就，一种有待询问、讨论、批评或部分否定的成就或一个实验，而不是被忽视。但这种实验性的，有野心的目的，根据我的判断，还没有受到我所期望的注意。为此我想借此机会解释一下这一目的，并阐明功能方法在实地调查和综合描述民族学材料中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性

我发表这部专著的目的是阐明功能方法的主要原则：我想证明，只有综合处理有关性的材料，才能提出究竟性生活对人们意味着什么的正确观点。本书要旨的另一方面是：如果仅仅挑出那些耸人听闻的材料加以惊叹或取笑，那么~~性~~整合细节，各方面的伴随作用，简言之全部的功能技巧都~~丧失~~

我打算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象~~性~~这样的主题，除非在

其习惯背景中，否则不能加以论述。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在于文化的其他方面。爱情、性亲昵、性行为，爱情巫术和神话的结合，只是特罗布里恩德人习惯性求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求爱只是一个阶段，即婚姻的准备阶段，而婚姻又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方面，家庭本身又是民族的分支，是母系亲属和父系亲属关系的分支。所有这些主题，是如此密切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亲属体系，该体系控制了部落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支配着他们的经济，占据了他们的巫术和神话内容，进入他们的宗教甚至艺术作品。

因此，作为性问题的开始，我不得不详细说明亲属体系和它在特罗布里恩德文化中的功能。我已经简略或仅仅简要说明了问题的语言方面——前兆不祥的亲属术语——曾经是如此广泛地讨论，调查记录中如此夸大的问题，以至有时怀疑它只是通往人类学错乱之路而不是别的什么。亲属问题我留待以后发表单行本，希望通过充分利用术语文献和语言材料，能为社会人类学开出一副药方。

然而，我在本书中的主要目的是指出你们到底应该从哪一方面接近它，性、家庭、亲属关系表现为一个不能破坏的有机整体。我不知怎么感觉到本书的假设或推论部分没“通过”。哈夫洛克·埃利斯看出了我的主要论点的意义，并在前言中进行了评论。伯特兰·罗素充分肯定了有关特罗布里恩德人父权材料的功能的重要性，并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婚姻与道德》一书中加以利用。杰出的美国作家弗洛伊德·迪尔（Floyd Dell）在他的《机器时代的爱情》中明确地应用了我的基本论据，那是一本我希望每个人都读一读的书，但很明显大多数读者尚不清楚我这本书更广泛的目的。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一直是那些耸人听闻的细节——众所周知的原始的不知父权，造爱的技术细节，爱情巫术（无疑是

个有吸引力的题目)的某些方面,以及一两件所谓母系制度的趣闻。

忽视父权及土著教条的社会动力

“不知父权”在本书看来是个很受欢迎的题目,但我认为那些高度评价我的材料的人忽视了两点。首先,特罗布里恩德人并不因“不知其父”而感到特别抱怨。事实上我们在他们中发现的是他们针对母权和父权事实的复杂态度,习惯认识的某些因素和胚胎学知识中的一些缺环影响了这一态度。这些认识的成份还受到泛神论信仰的窒息,受到群体的道德法律原则和个人感情倾向的影响。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在本书中我将不发表任何关于原始人类是否存在“对父权的最早无知”及是否特罗布里恩德人仍然因此而受到损失,或他们所信奉的是否为母系制社会组织作用于他们生理学知识的结果之类的意见。或许我已在早期的一部论著中由于承认特罗布里恩德人代表“原始无知”状态而促进了这种混乱。那还是1916年,发表在《皇家人类学会会刊》中的一篇文章,我对特罗布里恩德人关于轮回和生育过程的信仰进行了初步评论。我仍然认为当时所说大多有理,但作为一名实地调查者,我应该完全准确地从事实描述中得出自己的理论推测,无疑,我当时忠实于某些进化论点,这些论点我认为是不中肯的,即使现在它们无懈无击。

一个进化论者的公开认错

我认为,这是一个以公开认错的形式进行坦白的好机会。

1916年我在有关原始人类普遍忽视父权问题上保卫了西德尼·哈特兰 (Sidney Hartland) 的进化论观点。我还曾试图证明新几内亚和中澳大利亚的一些其他民族同特罗布里恩德人一样仍然受忽视父权的原始思想支配。

1923年和1927年我两次申明“坚信忽视父权是原始心理的最早特点，在所有关于婚姻起源及性习俗进化的推测中，我们都必须牢记这个基本忽视。”^①但本书1929年出版时第7章的读者发表没有关于“起源”、“早期状态”及其他进化论基本原则之类的论述，甚至没有附和它们。事实真相就是我已不再是一个进化论方法的基本崇拜者，并且我宁可不同意任何关于婚姻或其他事物“起源”的推测，也不愿即使间接地促进它们。因此从本书中完全消除所有进化论或再建的倾向不仅仅在方法上是更为拘谨的结果，而且在所有论述中坚持这一神圣原则，事实的陈述明显区别于推测论点。我对事实描述的改变也是由于我已越来越不关心起源问题的事实，起源，那是我在以往的言论中以幼稚方式所表达的。1916年我还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这种无知状态是原始的吗？仅仅是不适当的观察与推论导致了知识的贫乏，还是由于附加的泛神论思想遮掩了原始意识才导致的从属现象？”^②现在这个问题及这一类型的问题对我已毫无意义。任何知识、信仰或无知的源起形式无疑一直是个完全的空白。当猿人变成人时连表达兴趣的语言都没有。其他任何情况下的进化都如这种情况一样，是思想、习俗和制度的逐渐形成与区别。

① 《原始心理中的父亲》、第93页，参见《原始社会的性心理》，《灵魂》，1923年10期。

② 《巴洛马》，《皇家人类学会会刊》，1916年，第413页。